

周立波小说与十七年文学的南方审美话语建构

刘起林

(河北大学文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2)

摘要: 关于周立波小说“侧面表现”“时代气息不够鲜明”的评价, 是一种由地缘政治差异和地域文化独特性所导致的误读。中国历史的不平衡发展和“家国天下”的文化遗存共同作用, 形成了十七年时期地缘政治生态之北方中心区和南方辐射区的差序格局。周立波小说呈现出“侧面表现”的特征, 实因重在探讨这一时期南方政治文化辐射区接受北方政治中心话语的人格表征和思维模式。他的作品既展现了南方本土话语与政治中心话语相碰撞时的精神人格特征、思想观念状态与文化融合本相, 又深层次发掘了南方本土话语接受政治中心话语的话语阐释场景、意义解读路径和价值认同逻辑。以周立波小说为代表的十七年文学南方审美话语具有艺术经典性, 有力地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层次感和丰富性。

关键词: 周立波小说; 南方审美话语; 地缘政治生态; 人格表征; 思维模式; 艺术经典性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2)02-0169-12



一、“侧面表现”与被误读的周立波小说

周立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既与柳青、赵树理并列为“农村题材小说三大家”, 又被视为“茶子花派”的“领军人物”, 与“山药蛋派”的赵树理、“荷花淀派”的孙犁并立。但是, 关于他的小说风俗民情色彩浓郁而思想容量和时代精神不够突出的评价, 却也长期存在着。他的短篇小说就因民俗风情描写和轻喜剧情调, 未曾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对《山乡巨变》的阐释与评价中, 这种倾向表现得更为典型和突出。

早在十七年时期, 黄秋耘的创作同步评论就认为, 《山乡巨变》“对于时代风貌比较着重从侧面来进行描写”^{[1](776)}, “时代气息、时代精神也还不够鲜明突出”^{[1](784)}。新时期以来, 类似的文

学史阐释与评价更为普遍。郭志刚、董健、曲本陆、陈美兰、郑瑭担任定稿组成员的10院校编写组合著版《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认为, 周立波“表现的都是现实生活的重要主题, ……然而几乎又都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取材”^{[2](331)}; 如《山乡巨变》“在表现清溪乡合作化运动时, 对历史、时代的背景展示得不够充分; 在注意描写农民旧的思想负担, 表现合作化运动中尖锐的矛盾冲突的同时, 对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的一面还写得不够有力”^{[2](326)}。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也认为,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小说虽然“始终没有忽视表现富有时代色彩的重大主题”, 但习惯于将“重大的主题蕴含在日常生活的的事件和场面之中”^{[3](246)}, 以至“某些篇章中揭示社会生活的内涵还不够深邃, 矛盾冲突的开展也有不够充分的地方”^{[3](244)}。洪子诚、陈思和则从认同与肯定的角度, 分析了《山乡巨变》的这种特征。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指出, 《山

收稿日期: 2021-05-01; 修回日期: 2021-10-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的科学话语建构研究”(20AZW016)

作者简介: 刘起林, 男, 湖南祁阳人, 文学博士,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当代文学, 联系邮箱: liuqilin814@163.com

乡巨变》对“‘规格化’的主题和情节方式，作家更乐意通过特定地域的乡村日常生活来展开”^{[4](85)}。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认为，《山乡巨变》“把一场政治运动放在民间生活舞台上演出，回避了思想的深刻性”^{[5](38)}。进而指出，“人情美、乡情美和自然美，是这部小说所展示的主要画面，也可以说这里隐藏了沈从文笔下的湖南大山深处民间社会的菁华”^{[5](39)}。

以上诸种理解的立场和思路有异，对周立波小说特征本身的认识却是相当一致的。联系相关创作我们发现，这种定位性阐释隐含着诸多逻辑上未能周密和贴切之处。我们不妨以《山乡巨变》为例来略加辨析。

《山乡巨变》和《暴风骤雨》的基本情节格局，都是以工作队下乡为主线表现一场农村政治运动的始末，为什么《暴风骤雨》被看作是“这一时期的最鲜明的史诗”^{[6](290)}，而《山乡巨变》却变成了“时代气息、时代精神”不够鲜明突出呢？而且，《山乡巨变》的“正编”以邓秀梅在清溪乡的活动为主线，在表现合作化运动热气腾腾的景象方面，如连夜开大会学文件、清早喊喇叭搞宣传、挨家挨户动员，等等，并不逊色于《创业史》《三里湾》那种本地农民自我行动的形态。但为什么明明是直接表现合作化运动过程的《山乡巨变》，反而显得“对历史、时代的背景展示得不够充分”，还不如《创业史》和《三里湾》呢？再有，对《山乡巨变》时代气息局限的形成原因，研究者认为是作者“比较着重从侧面来进行描写”，更“愿意放在乡村人情、血缘、伦理等关系上处理”^{[4](85)}，但《三里湾》的情节主线就是几个家庭的内部矛盾和几对青年的爱情故事，为什么却没有形成同样的判断？

进一步从社会历史背景的角度看，湖南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上是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指导下开展的。合作化运动初期，湖南省委采取的是一种稳妥、谨慎的态度。1955年春耕快结束时才建立初级社13000个，半数以上还只是搭个架子；5月17日，毛泽东指示湖南要在年内建立45000个初级社；6月19日，他又亲自到长沙了解湖南农业合作化的进展，“严厉批评了省委在全国合作化运动‘春江浩荡’的喜人形势下却思

想保守，致使运动出现了‘暂徘徊’的局面”^{[7](70)}，湖南合作化运动才进入激进状态；8月份，中共湖南省委第七次代表会议将曾经的巩固、稳定性政策定性为右倾错误；11月，省委号召全省农村20万宣传员开展合作化宣传运动；12月3日，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表示两年内基本完成合作化；12月30日又向中央报告，声称湖南的农业合作社已发展到114664个，入社农户450万户，占全省总农户的57%，远远超过了毛泽东5月17日要求的指标。1955年底，为配合合作化运动中的并社、并乡、转高级社进程，省委督促各地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山乡巨变》的开头描写邓秀梅1955年初冬在“县委开了九天三级干部会”^{[8](3)}之后渡河下乡，所指的应该就是这次全省性的三级干部会。《山乡巨变》所描写的，恰恰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指导下的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最高潮时的状态。但即使是正面描写这样一种高潮状态的景观，《山乡巨变》给人的审美感受依然是“侧面表现”，对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的一面还写得不够有力”，“时代气息、时代精神”“不够鲜明突出”。原因究竟何在呢？

对此，较早提出《山乡巨变》“时代气息、时代精神”问题的黄秋耘，曾有过自己的疑惑与思考：“也许作者在生活中所看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出现在笔下的这个样子？”但他很快从另一个方向得出了结论，“对局部地区的生活细致的观察和对全国形势深刻的理解也要很好地结合起来”，“作家在满腔热情、全神贯注地反映某一个地区的生活变革的同时，必须着眼于全国的革命形势和整个时代的主流”^{[1](784)}。按照这种理解思路，问题就应当是《山乡巨变》所观察和反映的“局部地区”“某一个地区的生活变革”，不能代表“全国的革命形势和整个时代的主流”。那么，为什么同样是“作者在生活中所看到的……样子”，《暴风骤雨》《创业史》和《三里湾》中的艺术景观就能算作“时代气息、时代精神”坚实饱满，代表“全国的革命形势和整个时代的主流”，《山乡巨变》中的这个“局部地区”景观却属于“时代气息、时代精神也还不够鲜明突出”呢？

洪子诚从文学史整体格局的角度，提出过一个与此紧密相关的问题。他发现：“虽说南方农村是一些作家(如周立波、沙汀、刘澍德、谢璞、陈残云)的取材领域，不过，北方(晋、陕、冀、豫等)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从数量和获得的评价高度上，占据‘当代’农村小说的主要方面；这也可以看到与‘解放区’农村小说之间的延续关系。”^{[4](83)}其中指出了南北农村题材小说所获评价的差异，而且简略地提出了这种状况与“解放区”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洪子诚还指出，在“北方的农村小说作家中，存在着艺术倾向有所不同的‘群体’：一是赵树理、马烽等山西作家，另一是柳青、王汶石等陕西作家”，并从“新的价值观的灌输”、先进人物塑造的“浪漫理想色彩”、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本地人”与“外来者”的精神姿态、小说艺术资源的借鉴与开掘等方面，具体分析了二者的不同之处^{[4](83)}。从而相当敏锐地揭示了农村题材小说评价差异与作家、题材、审美传统的地域差异之间所存在的紧密联系。

孟繁华等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周立波“是在赵树理和柳青之间寻找着‘第三条道路’，即在努力反映农村新时代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转变的同时，也注重对地域风俗风情、山光水色的描绘，注重对日常生活画卷的着意状写，注重对现实生活人物真实的刻画”^{[9](137)}。

事实的确如此。在笔者看来，周立波是以湖湘大地所呈现的国家主流话语应对方式为基础，来表现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通过“对局部地区的生活细致的观察”，周立波实际上发现和建构了一种展现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南方审美话语形态。

由于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当时展现社会主义实践的南方话语客观上呈现出不同于北方话语的意义范式和表现形态。周立波以之为审美观照对象，即使是展现时代话语实践最高潮、最激进的状态，在以北方话语为本位的观察者看来，也有可能因其差异性、独特性而被视为“侧面表现”，“时代气息、时代精神”“不够鲜明突出”。换言之，对周立波小说“局限性”或“独特性”的判断与评价，其实是一种

由地缘政治差异和地域文化特性导致的理解误差。反过来我们又可以认为，流行评价所谓的“局限性”或“独特性”，也许恰恰是周立波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审美话语的拓展与丰富，恰恰是其文本审美建构的独创性乃至经典性之所在。洪子诚的“特定地域”说、陈思和的“民间生活舞台”说，正是这种思维翻转、另辟价值视野的产物。

二、南方审美话语的地缘历史文化基础

从客观历史事实的层面看，十七年时期展现社会主义实践的南方话语是建立在现当代中国地缘政治格局和“家国天下”文化遗存共同作用的基础之上的。古代中国存在着一种由家国一体的礼乐制度所建构的内在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格局起始于西周的分封制。一方面，“家国天下之间，通过层层分封与效忠而形成血缘—文化—政治共同体”；另一方面，“受到分封的诸侯与卿大夫对自己的封地有绝对的自主权，不受天子的支配”，而且“相互不隶属，各有各的特色”^{[11](2)}。差序秩序由此显现，并逐渐生成了整个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差序格局。先秦时期，中原王朝就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带为“华夏”，而称周边四方为“北夷、南蛮、西戎、东狄”。战国策士们沿“秦岭—淮河”一线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各诸侯国活动，“合纵连横”“远交近攻”，逐渐突显中华文明的中轴线，形成了中原正统文化和南北蛮夷文化，构成了中国历史从古代到近代的地缘政治大势。湖南地处中国长江以南，先秦时期即属于北方文明核心区之外的楚国版图，属于南方文明与文化的范畴。

中华民族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状态之后，南北一致的政治文化格局仍未形成。辛亥革命本身就属于地方对中央的革命。民国初年，各省“皆以排外为唯一之能事，遂以二千年大一统之国，几复返于土司政治”^{[12](2587)}。袁世凯死后，中国更进入了军阀混战、南北对立的乱世状态。北伐战争以“打倒军阀，除列强”为目标，但蒋介石南京政府最后直接控制的不过是华东数省，全国仍然处于一种地方半割据状态。抗日战争期间，中

国则呈现出一种根据地、大后方、沦陷区并存的历史地理格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起源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地方性路径,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13](188)}中,红色政权属于“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治”^{[13](190)}。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力量获得极大发展,到抗战胜利前夕,“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19个大的解放区”,而“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人口150万,……除了浙东、琼崖两区之外,按其人口说来,它是一个最小的”^{[13](1044)}。故此,毛泽东指出:“有些人不明瞭这种情形,以为所谓中国解放区,主要就是陕甘宁边区。”^{[13](1044)}究其原因,除了国民党封锁政策造成的误会,更与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央政治话语所在地密不可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1945年11月,“我军已撤退的浙东、苏南、皖中、皖南、湖南五个解放区全被国民党军队进占”^{[13](1167)},政治历史格局又起了新变化,南北差异变得更为明显。

1948年,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地理状况,将全国解放区划分为三类,即:“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日本投降至大反攻,即1945年9月至1947年8月两年内所解放的地区……可称为半老区”,以及“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13](1277-1278)}。1948年10月28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决定从“现有五大解放区”中,“分配华北一万七千人,华东一万五千人,东北一万五千人,西北三千人,中原三千人”,短期培训后成建制配置,随军南下接管和建设南方新解放区^{[14](426-431)}。1949年,毛泽东部署“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时又指出,“南方乡村,因为完全是新区,和北方老区的工作根本不同”^{[13](1406)}。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强调,“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13](142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之局,全国“一盘棋”的政治秩序总体上形

成。但全国政治格局的差异化特征仍然存在,既有“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13](1511)},又有“大约有2.9亿农业人口的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和待解放区”^{[10](90)}。根据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在土改斗争中总结老解放区经验,对新解放区内部也实行了差异化的政策。一是“制定了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10](92)};二是在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侨乡制定若干特殊政策,“纠正了土改中一些地区侵犯侨眷、影响侨汇的错误”^{[10](98)};三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团结,慎重稳进’的方针和更加缓和的步骤”^{[10](98)}。南北差异,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和沿海、边疆的差异,都在这中间鲜明地体现出来。本文中的“南方”概念,就建立在这种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全国政治版图认知与区分的基础上,并具体地将首都北京和北方老解放区界定为政治文化的北方中心区,将广大南方新解放区界定为北方政治文化辐射区。

事实上,即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全国形势的地区差异也还是相当明显的。1953年,属于老解放区的“华北、东北、华东等局部地区出现了急躁冒进现象”^{[10](221)},而南方的合作化运动还没发动起来。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1955年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决定分地区采取“停、缩、发”的不同方针:“东北、华北、华东各省(除内蒙古外)一律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中南、西南、西北各省,认真巩固已建立的社,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山东、河南等省将原订过高的计划适当收缩。”^{[10](233)}直到这一年4月和6月两次到南方视察,毛泽东才改变对农村形势的看法,亲自将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向了全国性展开的新高潮。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所表现的,就是这种高潮时期的合作化运动状况。

南北地缘政治差异也在文化话语的不同建构中表现出来。“传统社会的现实世界和意义世界,是镶嵌在宇宙、自然、社会的系列框架之中的,……在古代中国,乃是一个家国天下连续体。个人的行动和生活的意义,只有置于这样的框架之中才能得到理解并获得价值的正当性。”^{[11](1)}

但在清末民初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发生了一场挣脱家国天下的“大脱嵌”，出现了“家国天下连续体的自我断裂和解体”^{[1](7)}，既“为国家理性铺垫了走向最高权力的红地毯”^{[1](10)}，又使中国人“自我摆脱了家国天下的共同体框架”^{1}。于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体系中，个人如何与新的民族国家权力互动，如何建构现代的自我认同，就成为重构家国天下秩序与现代人自我的核心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权利的原则进入生活世界代替伦理价值在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1](11)}；另一方面，“家国天下”的传统意义逻辑和价值原则又进入政治领域中，参与了新的自我认同的建构。传统中国的差序格局，则决定了家国天下的意义遗存不仅表现为儒家思想观念等传统主流文化，在政治文化的非核心区域更表现为地域性的特殊价值视野、思维惯性和意义逻辑。

作为自古以来的南蛮之地，湖南一方面是“湖广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另一方面又处于华夏文明的非核心区域，其民间向来有“信巫鬼，重淫祀”的地域文化风习。近世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原则大大强化了湖南人沟通外在现实、接受外来思想观念的精神趋势，湖南志向崇高的读书人和蛮勇强悍的从军者秉持这种思想理念，造就了湖南作为近现代中国一个重要思想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对湖南城乡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冲击。但这种思想文化地位和精神传统在现代湖南的本土空间并没有不间断地传承下来，大革命后的湖南就进入了国统区和抗日战区状态。湖南乡野大地的民间文化体系也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作为新解放区、政治文化辐射区，尽管有毛泽东主席经常性的特殊关怀和亲自指导，地缘政治生活也仍然呈现出中央政治文化和湖南地域文化在差异与碰撞中相互作用、相互交融的状态，任何一方都难以形成压倒性优势。在这样的趋势下，以湖南地域文化特有的意义视野和思维逻辑来解读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进而建构个体的家国互动和自我认同，就成为湖南基层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地缘政治现实。

周立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湖南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正如茅盾所言，是着力“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15]。周立波认为，作家创作的风格特色应该是其思想气质的表现，而作家的气质则应该是“你要表现的群众的思想感情，在你自己心里的潮涌和泛滥”，“要写农民的悲喜，你自己的思想情绪就得和农民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换句话说，要有农民的气质”^{[16](242-243)}。事实上，周立波1955年回到湖南益阳的老家后，“长期深入农村生活……长时间接受农民质朴气质、诚实作风、高尚情操和幽默乐观生活趣味的影响，使他也自然而然地像一个朴素老实的农民一样去观察、体验生活，并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上加以分析理解，通过独特的构思和描写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个性”^{[2](333-334)}。也就是说，周立波小说的精神气质和风格特色，实际上是以中国“南方农村”的、“朴素老实的农民”的思想感情为基础而形成的。

这样的审美主客体有机融合，使得周立波在考察南方政治文化辐射带的家国互动状态时，显示出鲜明的地域价值认同特征。具体来说，周立波发现和描述了南方政治辐射区的乡村百姓是如何以地域文化色彩鲜明的路径和方式，来理解出自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话语，从而进入中央政治话语体系的。他由此建构起来的新中国社会主义经验“南方话语”，实际上是一种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南方本土化再解读，其中既体现了中央政治话语进入基层社会的复杂表现形态，也揭示出南方社会转换自我精神话语、融入社会主义新文化结构的独特路径与方式。

三、周立波小说南方话语的人格表征建构

周立波的小说广泛地描述了南方本土话语与政治中心话语相碰撞时的精神人格特征、思想观念状态和文化融合本相，意蕴丰满地建构了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进入南方政治文化辐射区的人格表征。这种意义建构特征在《山乡巨变》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首先,《山乡巨变》描述刘雨生的“本真人”秉性和邓秀梅的“湘妹子”情态,鲜明地揭示了政治中心话语和南方乡土性情相融合的精神人格特征。

刘雨生作为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并不具有“雷厉风行的作风,叱咤风云的气派”^{[1](779)},而是更多地凭借南方农民“没有花言巧语的本真的至性”^{[8](121)}。“本真”是一个湖南方言,根据方言的读音又可写作“本忠”,就是本分、忠实、真诚的意思。正因为做人“本真”,刘雨生作为在外抛头露面、并不缺乏威信干部,才会在家里有理也受老婆张桂贞的气,委委屈屈,以至在群众会上作报告时都“脸上有愁云,眼睛含着沉郁凄楚的神色”^{[8](51)}。也因为对党和党的事业具有“本真”的态度,刘雨生又打定主意:“不能落后,只许争先。不能在群众跟前,丢党的脸。家庭会散板,也顾不得了。”^{[8](49)}还是因为对家庭和婚姻的“本真”,他才会张桂贞夜里提出离婚并转身冲出房间后,赶紧追了出去,因为“外头墨漆大黑的,我怕她叫野物咬了”,“我还怕她寻短路,吃水莽藤”^{[8](117)}。总之,正是以这种“本真的至性”为基础,刘雨生才深得组织和群众的信任,虽然思想境界并不很高、农业技术并不很强,却成为合作化运动忠实可靠的带头人。

邓秀梅虽然是县委工作队的干部,其实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本地人。她具有“全力以赴、顽强坚韧地工作一些年,把自己的精力充沛的青春献给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8](2)}的精神境界,但也有青年干部性格不成熟、经验不老到之处。刚参加工作“当人暴众”地讲话时,她曾“两脚直打战”“出了一身老麻汗”^{[8](6)},后来虽然“肯吃苦耐劳,能独当一面,只是由于算术不高明,她的汇报里的数目字、百分比,有时不见得十分精确”^{[8](6)}。而且,邓秀梅作为女干部随时都“没有忘怀妇女方面的利益”,对于做“旧式妇女”和别人“一脑壳的封建”格外地敏感。如果说这些精神品质和性格特征尚可归入“革命新人”成长的范畴,那么邓秀梅的种种小女儿情态,则更为明显地体现出南方农村姑娘的乡土性情。她说到怀孩子也“脸有点红”,“其实也蛮喜欢小孩子”^{[8](4)};一起开会九天,将要分别时,

她“心里忽然有点舍不得大家”^{[8](5)}。种种外在泼辣而内含娇羞、缠绵的情态,与清溪乡农村姑娘盛淑君并无太大的差别,所体现的正是湖南“湘妹子”的普遍性情。

刘雨生的“本真的至性”和邓秀梅的小女儿情态表明,南方政治辐射区本地干部的基本人格特征中,存在着鲜明的乡土性情。

其次,《山乡巨变》揭示李月辉的“婆婆子”性格和谢庆元的“冷热病”,鲜明地展现了政治中心话语和南方乡土现实相结合的思想观念状态。

李月辉“是一个很好合作的同志”^{[8](6)},但“是个婆婆子,太没得煞气”^{[8](102)},总是强调“从容好干事,性急出岔子”^{[8](108)},被陈大春指手画脚地喊“小脚女人”^{[8](105)}也不生气。这种态度既是李月辉的个性特征,更是对革命规律和区域民情进行双重适应而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李月辉对此有着自己的深入思考。在适应革命规律方面,他想到的是:“有个北方同志教导过我说:‘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对革命是害多益少。’革命的路是长远的,只有心宽,才会不怕路途长。”^{[8](104)}在联系群众、适应本地民情方面,他考虑的是:“我最怕的是人家怕我。……党教育我:‘共产党员一时一刻都不能脱离群众’,我一逞性,发气,人家都会躲开我,还做什么工作呢?”^{[8](105-106)}“婆婆子”这个称谓本身,就是湖南民间略带贬义地嘲笑中年男人“性缓,又没得脾气”^{[8](104)}的俗语,李月辉正是将南方地域文化性格融入自我政治思想观念的建构之中。直到《山乡巨变》的“续编”,李月辉常常将当代政治文化的“辩证法”概念不无滑稽色彩地挂在嘴边,才为他的“婆婆子”性格真正寻找到理论的依据,但这更反衬出“婆婆子”性格内在的本土文化特色。

副社长谢庆元在工作上患“冷热病”,动不动就“撂挑子”。他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却不是《创业史》郭振山式的“政治退坡”,而是“家里吃口多”、经济困难,又好嘴贪吃、“还想添一点油荤”^{[8](398)}。作品的这种解说,实际上是将意识形态范畴严重的政治思想问题,转化成物质贫困状况下情有可原的“贪口腹”问题。“烂秧”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谢庆元还被开了一场激烈的

“辩论会”，但实际上是谢庆元“懂得门径”^{[8](378)}，责任区的秧苗管理得好，反而是刘雨生不会管理、责任区烂秧，需要谢庆元支援。谢庆元不过是没有将“多余的秧先尽社”^{[8](381)}，而是答应了单干户秋丝瓜，才变得失去道理，被批为“闹独立性”^{[8](381)}。他这种做法的背后，也不存在破坏合作化、支持单干户之类的主观政治意图，只不过是先前借了秋丝瓜两斗糙米，后来又被秋丝瓜“给了一撮箕米，一块腊肉”^{[8](383)}，在物质层面有所收买。正如谢庆元老婆所说的，他如果“走退坡路”，“去搞副业，挑点发脚，家用还宽裕一点”^{[8](393)}，但谢庆元并没有这样做。更为重要的是，当李月辉“再开张条子，归了张桂秋的米账，还足足吃得到接新”^{[8](398)}，谢庆元的积极性又高涨起来，又以“有两下子”的工作实绩获得了“群众的良好反映，领导的奖掖的评语”^{[8](401)}。很显然，作者描述谢庆元的形象时，没有对经济诉求进行政治立场的转换，而是采用一种对工作态度进行物质需求溯源的审美思路，大大淡化了事件中内含的政治性质和政治文化色彩。其中所体现的，正是南方辐射区的思想观念话语中政治色彩趋于弱化的精神现实。

最后，《山乡巨变》对陈先晋和亭面糊两个“中间人物”本色老农形象的描述，深刻展现了南方政治辐射区接受政治中心话语的文化融合本相。

亭面糊与陈先晋存在诸多共同之处。他们有着相似的“发财梦”和奋斗失败经历。陈先晋“天天发狠做，一心想发财”^{[8](148)}，总是“盼望走运，常常想在路上捡一块金子，也想从山里挖出一窖金元宝来”^{[8](149)}。“四十年间，陈先晋不是没有起过水”，但自己绊一跤请个草药郎中，两三个月就“现款花得精光，猪也都调了”^{[8](149)}。亭面糊“也起过好几回水呢。……只差一点，要做富农了，又有一回，只争一点，成了地主”^{[8](9)}，但也是“两场病，一场空，收的谷子用得精打光，人丢了，钱橱也罄空，家里又回复到老样子了”^{[8](9-10)}。他们都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深怀感激，对新社会衷心拥护。亭面糊“搭帮共产党、毛主席”给他“分一幢地主的横屋，一色的青瓦”^{[8](11)}，陈先晋土改时“分了田，喜得几夜没有睡”^{[8](149)}。

拥护新社会和“反正单干也没发过财”^{[8](141)}这两条，成为他俩对合作化虽然犹疑观望且内心排斥，最终却能服从和适应的深厚心理基础。

陈先晋对合作化的怀疑态度，是基于传统农耕文化的思想惯性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在他看来，“积古以来，作田都是各干各”^{[8](126-127)}，“树大分叉，人大分家，亲兄嫡弟，也不能一生一世都在一口锅里吃茶饭”^{[8](127)}，“龙多旱，人多乱，几十户人家搞到一起，怕出绿戏”^{[8](144)}。但这个“发财老倌子”一生勤苦的目的是为了“一家身口”，“看见女婿、崽女，连婆婆也在里面，都劝他入社”^{[8](141)}，不由得对自己的坚持心灰意冷：“我老了，何必替他们操隔夜心呢？”^{[8](150)}女婿“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8](146)}的说法，也引起了他的深思。于是，他终于决定“大家都入，也只好入了”^{[8](152)}，“公众马，公众骑，……以后只认得做，只认得吃”^{[8](150)}算了。显然，作者是从农民的小生产意识和家庭观念出发来描述陈先晋形象，揭示他对新型政治中心话语的思想适应逻辑和政治服从真相的。

亭面糊对新型政治话语的服从和适应，则体现出另一种地域文化特色。正如作者所言，“面糊是我们这带乡间极为普遍的性格”^[17]，具有鲜明的南方地域文化色彩，基本特征是忠厚不精明、糊涂心肠热。亭面糊面对新型政治话语，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一是政治思想观念糊涂。亭面糊虽然在政治情感层面由衷地感谢共产党、拥护毛主席，但他“不喜欢开会”^{[8](47)}，思想上对“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等政治理论问题始终处于糊涂状态，缺乏老解放区百姓那种训练有素、深入骨髓的政治觉悟。他之所以炫耀自己“起过好几回水”“只争一点，成了地主”，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二是政治行为上热情参与、顺应服从。亭面糊虽然思想观念糊涂，对新社会、新生活却始终秉持一种感恩基础上的服从、顺应心理。正因为如此，亭面糊才将自己对合作化的犹疑态度说成是“婆婆开头有点想不开”^{[8](89)}；也因为如此，他才不管自己能否信任，都积极地要求前去监视暗藏的敌特分子龚子元。三是亭面糊虽然看似洋洋得意实则昏聩糊涂，自认为左右逢源实则令人啼笑皆非，但他确实本性善良、忠

厚,对新生活、新事物充满热情,而且具有强大的亲和力。“他一碰到知心识意的朋友,就能诨得好半天”,“话匣子一开了头,往往耽误了正事”^{[8](40)}。在合作社成立大会上,只有他“汗爬水流,挑起一担丁块柴,走进乡政府”来给大家烤火,表示“成立农业社,搞社会主义,叫你们冷得缩手缩脚的,心里过不去”^{[8](277)}。亭面糊的这种种性格特征表现出鲜明的地缘政治和地域文化色彩,既体现了政治中心话语对南方辐射区民众的强大影响,又显示出南方文化性格接受政治中心话语的独特形态,因而显得格外地形象丰满、性格鲜活。

四、周立波小说南方话语的思维模式揭示

周立波的小说还深层次地发掘了南方本土话语接受政治中心话语的话语阐释场景、意义解读路径和价值认同逻辑,深刻地揭示了南方政治文化辐射区应对和接受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思维模式。这方面的特征,在他的《山乡巨变》和短篇小说中都有相当鲜明的表现。

首先,周立波小说常常将政治生活场景和休闲娱乐场景夹杂在一起进行描述,准确地揭示了南方政治文化辐射区接受和阐释政治中心话语的独特场景特征。

《山乡巨变》在情节叙述的过程中,常常着意描述政治生活场景中的休闲娱乐片断,甚至使政治生活场景处于边缘化的意义位置。按常规审美逻辑,会议描写最有可能紧贴政治话语、紧贴合作化运动的思想主题来展开,但作者描述邓秀梅在入乡当夜开会传达上级文件精神时,却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来描述会议休息期间的“打扑克”和关于李月辉“爱做媒”的闲扯。“争吵”一章描写群众动员会的场面,作者却插叙了刘雨生“婚变”的苦闷,又叙述了符癞子流里流气地揭刘雨生“隐私”的过程。描写合作社欢庆丰收和胜利的大会,作者首先插叙了亭面糊用卖红薯的公款到饭铺子喝“老镜面”的事情,又叙述了领导们离开会场跑到刘雨生家喝喜酒的“私事”,还不断岔开来叙述小孩子们模仿戏台上的表演

内容的顽皮举动。最具时代政治文化色彩的会议过程,却夹杂着如此众多的乡村社会的“私事”和“闲扯”,反而真切地体现出庄严崇高的政治中心话语在散淡庞杂的南方乡村被传播和接受的真相。不能不说,这是作者的一种独特审美发现。

在周立波的短篇小说中,政治中心话语的传播和接受场景更为日常化、休闲化、民俗化。《禾场上》的邓部长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创办高级社的制度特征和各种社会新风尚,根本不是在庄严的会议上,而是在老百姓夜晚乘凉时的禾场上。恰恰是在这种场合,“上头来的人……和和气气,有讲有笑的,从来不骂人”^{[18](42)},取得了更好的宣传效果。无独有偶,《翻古》描述忆苦思甜、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也没有选择忆苦思甜大会,而是独具只眼地选择了李二爹带着满崽和长孙选茶籽的场景,选择在邻舍小把戏们涌进来听“翻古”“讲汉”的过程中。在作者看来,正是在这样的场景中,“古代和现代的智慧、幻想、悲怆和欢喜,由老人的口,一辈一辈传下来,一直到将来,一直到永远”^{[18](180)}。政治文化话语融入南方辐射区百姓精神世界的独特场景特征,由此鲜明地体现出来。

其次,周立波小说在叙述政治文化话语的过程中,常常旁逸斜出地描述人物的各种“闲扯”和幽默、调侃性对话,借此揭示南方政治文化辐射区以缓冲和淡化其庄严感、陌生感为前提的政治中心话语解读路径。

周立波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在完成“正事”的过程中不断地“天南地北,闲扯起来”^{[18](85)},与“正事”本身的严肃性和理解难度构成鲜明的反差。茅盾称之为“在繁铎密鼓之间,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一二小事,亦颇幽默可喜”^[15]。这种对“闲扯”“小事”的描写显得“幽默可喜”的重要原因,就是存在着地域文化色彩鲜明的“戏谑”和“调侃”。“闲扯”“调侃”在这里的核心价值,并不是渲染艺术氛围、彰显叙事个性,而是以之为“弱者的武器”,来形成一个精神和心理的缓冲空间,淡化政治中心话语的正统性、庄严感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陌生感,从而更轻松地进入理解和阐释的境界。

《山乡巨变》在介绍盛家大姆妈申请入社的过程中，对她讲述自己包小脚、生八个女儿和一个满崽的过程也进行了详细描述。这种描述展现了盛家大姆妈“做阳春，收八月，田里土里，样样事情，无一不求人”^{[8](96)}的生产生活状态，倒也兼具体现合作化优越性的功能。随后，作者又详细叙述了她要将一只生蛋鸡也交公的细节，描述她首先絮叨干部们“隆日隆夜，为大家开会，辛苦了，吃个把鸡，补一补，也不为过”，然后又猜想和询问“鸡不要，鸭子想必是爱的。……我拿这只鸡去换个鸭子来给你，好不好？”^{[8](97)}这种滑稽色彩鲜明的“闲扯”，作者描述起来却显得津津有味。因为正是在这种近乎“闲扯”的过程中，盛家大姆妈加深了对曾经陌生的政治中心话语的理解：“鸡都不要，真是杯水不沾的清官。”^{[8](98)}

周立波的短篇小说甚至存在着作者本人在叙述过程中的大量“闲扯”。《禾场上》关于扁担星的议论、关于邓部长吃不吃糖的招呼 and 脚猪子老倌的争吵，《山那面人家》关于姑娘们爱笑的“考证”和兽医天南地北讲空话的嘲讽，《下放的一夜》关于蜈蚣精的对话，《张闰生夫妇》关于生产队长喜欢斩鸡诅咒的叙述，都属于这类笔墨。作者大量地描述各种幽默、滑稽色彩鲜明的人和事，而且在叙述人物的“闲扯”中，自身也洋溢着幽默、调侃的意味，文本艺术境界因此以强烈的审美亲和力大大淡化了政治性话语内在的庄严性和紧张感，降低了解读政治话语的门槛。

最后，周立波小说在描述人物的对话内容时，广泛地展开了各种“老班子说”和神秘文化的内容，深层次揭示出南方政治文化辐射区理解政治中心话语、建构自我价值认同的精神基础和思维逻辑。

种种“老班子说”和巫鬼神秘文化的传说与意象，在周立波小说描述的各种“闲扯”中随处可见。《山乡巨变》描述谢庆元吃水莽藤寻“短见”的过程，就存在大量以神秘文化逻辑展开的调侃与“闲扯”。首先是亭面糊对谢庆元是否“背时”的问题，一本正经地按巫楚文化逻辑进行了探讨：“你在堂客晒小衣的竹竿底下过过身

吗？”“你用女脚盆洗过澡没有？”“两公婆打架，你挨过她的鞋底吧？”“要不，一定是你们小把戏早晨放了快。”^{[8](429)}然后是盛家大姆妈提出“莫不是碰到水莽藤鬼了？”^{[8](432)}的疑问，并且用巫鬼文化的逻辑继续思考下去：“水莽藤鬼，落水鬼，都要找到了替身，才好去投胎。”^{[8](433)}即使是事后治保主任盛清明的嘲笑，也烙上了鬼神文化的印记，“活得不耐烦，想到阴司地府去参观访问了？开了给阎老五的介绍信吗？”^{[8](442)}如此这般，一场本来事关生死、明显带有政治色彩的自杀事件，就演变成了一个深具地域文化色彩的生活事件。恰恰是在这独特的解说之中，政治文化辐射区百姓的心理倾向和思维逻辑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是自己在新社会、新生活中“充满了人世的欢喜”，于是对别人“好好端端，怎么吃起水莽藤来了？”^{[8](432)}大惑不解，但又难以用更具政治中心话语色彩的意义逻辑来揭示，只好转而用他们所熟悉的神秘文化思维来展开想象和议论。

短篇小说《桐花没有开》的核心情节，是描述张三爹死守古训、反对提前泡种，却败于“新人”盛福元等人采用新的科技方法泡种的成功实践。但是，从“穷人不信富人哄，桐树开花才下种”^{[18](19)}的“老话”到“老班子说：‘虎出太平年’”^{[18](32)}，再到老虎到底有没有灵性，一直到老虎既然有灵性就应该调到气象台工作的调侃，作品人物在闲扯“老班子说”方面也进行了一番较量。作品明显表现出“正事”和“闲扯”两方面较量有机交融的特征。短篇小说《下放的一夜》首先描写王凤林被蜈蚣咬伤后村民们为他治伤的过程，随后洋洋洒洒地描述起村民们关于民间神秘文化的“闲扯”。老农民卜老倌先扯了专治蜈蚣咬伤的法水，又说到蜈蚣精会变成专门勾引男人的美女，还讲到蜈蚣精最怕鸡公。但他的神秘文化怪论不断遭到年轻人的质疑与反驳。关于“法水”疗伤的说法，他婆婆就揭穿了他：“我记得也是上边伯娘治好的。”关于蜈蚣精噙人，一个后生子接口：“世界上根本没有精怪。”关于蜈蚣精怕鸡公，小孩子“不怕鸡婆吗？”的随便一问^{[18](86-87)}，就使他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这种种对于老百姓“闲扯”的描述，一方面呈现出湖

湘民间的神秘文化思维特征,再现了新生活、新生产方式在民间古训、谚语层面所获得的解释,揭示了南方社会认同新型价值话语的精神基础与思维逻辑;另一方面又展现了新科技、新生活话语对各种神秘文化的拆解、抵消和善意的嘲讽,别开生面地表现了社会主义新风尚渗入南方农村的独特形态。

在传统家国天下的话语体系转型之后,虽然“原来具有天道神魅性的天下则转型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11](9)},但“家国天下”的思维逻辑中“天下秩序”的方向并未完全阻断,“天道神魅性”的遗传也就是必然的现象。在中国南方,湘楚民间的巫鬼神秘文化就是一种“天道神魅性”的意义存在。周立波小说中的人物在对话和思考中展现出大量神秘文化的语词、意象和意义逻辑,其实是在用一种本土文化的思维逻辑来克服障碍,解读新型政治中心话语影响下所形成的各种社会现象,进而重构天下秩序话语的自我认同。周立波小说神秘文化“闲扯”的深刻意义,由此就充分体现出来。

总之,周立波小说从呈现政治生活场景中的休闲片段到大量描述作品人物的各种“闲扯”和幽默调侃性对话,再到大量表现他们的神秘文化思维,实际上都是为了从地域文化思想路径和意义逻辑的深层次,来展现弱势的南方、闭塞得不无蒙昧色彩的政治文化辐射区对于中央权力话语、外来革命经验的消化与理解。这正是周立波独具特色地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南方审美话语建构的努力。

五、周立波小说南方审美话语的艺术经典性

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话语总体上表现出高度一体化的特征,但由于现代历史地缘政治格局和文化传统差序结构的影响,内在的异质性和多元性有着形态或隐或显、时间或长或短的沿袭,却也是客观的事实。周立波小说所揭示的,正是南方政治文化辐射区的基层社会、普通民众解读和应对新型政治中心话语的表现形态与意义逻辑。

十七年时期还有不少长篇小说,同样属于新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南方审美话语建构。这些作品大多遭遇过被误解、冷落甚至被批判的审美命运。现代著名作家王西彦在湘东和皖北两次参加土改运动,写出了记载“原始材料”的《湘东老苏区杂记》后仍不能自己,于是以“尊重生活,服从生活的逻辑,绝不允许戴起有色眼镜去歪曲生活,改变生活的面目来迁就自己的观点”^{[19](920)}的审美态度,创作出长达60万字的长篇小说《春回地暖》。这部作者自认为“尊重生活”的作品,却被责难为“过多地渲染了农村生活的落后面,描写了农民的保守、不觉悟”^{[19](919)},遭遇了“一场突然而来的批判运动”^{[19](923)}。广西作家中,陆地所创作的《美丽的南方》表现土改斗争,被批评为“侧重于这一生活进程的抒情侧面,不大着重震撼人心的冲突提炼,豪迈奔腾的场面渲染和强烈紧张的情节铺陈”^{[20](189)};刘澍德的《归家》以爱情纠葛的家庭关系渊源为情节主线展开农村生活画面,也被批评为“纠缠于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矛盾和误会中”^[21]。广东作家中,于逢的《金沙洲》表现经济作物区的生产发展方向和上中农退社的风潮,在争论中或者被批评为“没有抓住现实的本质和主流”^{[22](9)},或者被辩护为“符合于金沙社这一特定环境的生活逻辑”^{[23](166)};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基于对地缘政治特征的深入体察,描述并批评了主人公许火照的“软弱”“老好人”态度,但这一人物形象还是被批评为“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过得硬’,政治嗅觉不灵敏,只是埋头搞生产,想改变东涌的贫穷面貌,对于阶级斗争实际上是陷入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状态”^[24]。这些表现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南方话语形态的作品,竟然都被判定为不属于“时代精神的最强音”,不能不说其中隐含着某种带规律性的认知误区。

实际上,从《春回地暖》到《美丽的南方》《归家》,再到《金沙洲》《香飘四季》,这些作品都具有中国南方新解放区、政治文化非中心地带的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

首先,创作者都具有扎实的相关生活积累。《春回地暖》和《美丽的南方》的作者中,不仅王西彦在湘东和皖北两次参加土改,陆地也是先

在东北后在广西两次参加土改运动，这两部作品就是他们以在湘东、广西的土改运动亲身经历为基础而创作的。《金沙洲》的作者于逢曾到顺德一个“富裕乡住了一年，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很少回广州”，终于由“外地人”变成了“本地人”^[25]。陈残云担任过东莞县委副书记，并且直接兼任中堂公社党委的第一书记。刘澍德长期以云南为“第二故乡”，以云南农村为生活基地，1963年出版的《归家》中情感纠葛的基本框架，在他195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名篇《桥》中就出现过，真可谓反复斟酌、酝酿长久。

其次，从文本意义建构本身来看，王西彦的《春回地暖》重在揭示农村的保守、落后和农民的觉悟迟缓，运动过程描写缺乏暴风骤雨式的慷慨激昂。这是因为湘东作为革命政权已经很巩固的新区，执行着一种缓和、渐进的“和平土改”政策；这里在大革命时期曾建立过苏维埃政权、遭遇过残酷的屠杀，农民心灵深处存有担心历史重演的阴影。两方面相结合所体现的，恰恰是南方新解放区革命历史演变的坎坷性与复杂性。《美丽的南方》以北京知识分子来到陌生的广西乡村协助土改为中心情节，本身就呈现出一种中央文化区与边地文化区对视、交流的文本意义建构。双方在互为新奇、相互克服与改造的交往中所体现的，则是国家和地方之间人情味浓郁的同构与互动。作者对南方自然景观与民俗风情满怀温情的描写，更将边地文明淡化和消解政治话语严酷性的文化特征充分呈现出来。《归家》中朱升“交情大于王法”的“历史陈迹”，同样是政治文化非中心地带将政治话语置于边缘性生活位置的具体体现。《香飘四季》以“战胜自然”为中心，把阶级斗争内含于生产斗争描写中，也不是所谓的“政治嗅觉不灵敏”，而是在南方的政治文化非中心地带，生产斗争、经济发展确实居于社会生活的第一位。《金沙洲》中的妇女干部梁甜担心加入高级社经济上拖累别人，合作化带头人刘柏力图以经济胜利回击上中农的进攻，包括退社风潮中通过“算账”反对“以强养弱”“大家拉平”“生蛤拉死蛤”的落后观点，都体现了南方经济作物区政治意识淡薄、重商主义盛行的“特定环境”特征。总之，这些作品的文本

意义特征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南方生活形态和人物形象本身不够政治化、不够符合政治中心话语规范的特征。创作者恰恰是以现实主义作家的真诚和勇气，直面了南方政治文化辐射区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和主流状态。

在这一系列南方农村题材作品中，周立波的创作极具审美代表性。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和20多个短篇小说，分别从时代大事件和社会新风尚两方面，建构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经验南方话语的外在表现形态与内在意义逻辑。通过揭示南方话语在时代话语整体格局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周立波的小说有力地呈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层次感和丰富性。以此来看，他的作品不仅不存在“历史、时代的背景展示得不够充分”“揭示社会生活的内涵还不够深邃”的问题，反而堪称是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路径拓展、境界深化的艺术硕果。

由于中国南方地缘政治生态与政治中心话语的差异性，也由于南方政治话语往往是建立在地域文化意义逻辑的基础上，教条主义地以政治中心话语为本位的研究者进行解读与判断时，就势所必然地存在地域文化和政治站位的双重障碍，以至未能真正深入而准确地捕捉住其中所表达的时代文化信息。十七年时期关于周立波小说“时代气息、时代精神”“不够鲜明突出”之类的批评，新时期将《山乡巨变》的政治话语独特表现形态解读为民间话语对政治话语的消解，都属于从这种思维误区出发的审美误读。这种种审美认知和意义认同的局限，在相当程度上阻隔了对周立波小说时代普遍意义和审美经典价值的深入理解。

参考文献：

- [1] 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C]//冯牧.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文学理论卷1.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 [2] 十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3]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第2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 [4]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5]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 [6] 芝. 推荐《暴风骤雨》[C]// 李华盛, 胡光凡. 周立波研究资料.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 [7] 张勇. 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村经济变革: 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1951—1956)[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5.
- [8] 周立波. 山乡巨变[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 [9] 孟繁华, 程光炜.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 [11] 许纪霖. 家国天下[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 [12]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 第5册[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 [1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4]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C]//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7册.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 [15] 茅盾. 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 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 [J]. 人民文学, 1960(8): 10—38.
- [16] 周立波. 周立波选集: 第6卷[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 [17] 邹理. 故人 故乡 故事——周立波的故乡情结[J]. 新湘评论, 2012(3): 36—38.
- [18] 周立波. 山那边人家[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 [19] 王西彦. 王西彦选集: 第4卷[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
- [20] 蒙书翰. 陆地研究专集[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5.
- [21] 樊骏, 吴子敏. 《归家》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J]. 文学评论, 1963(4): 1—18.
- [22] 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评论组集体讨论, 蔡运桂执笔. 略谈《金沙洲》[C]// 典型、批评方法及其它——关于小说《金沙洲》的讨论.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2.
- [23] 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论研究组. 论《金沙洲》[C]// 典型、批评方法及其它——关于小说《金沙洲》的讨论.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2.
- [24] 杭志忠, 沈原梓. 我们对《香飘四季》的看法[J]. 文学评论, 1965(4): 24—30.
- [25] 于逢. 《金沙洲》遭遇记[J]. 文艺理论与批评, 1993(4): 58—62.

Zhou Libo's nove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uthern aesthetic discourse of the 17-year literature

LIU Qilin

(School of Litera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The evaluation that Zhou Libo's novels are of "side performance" and are not clear enough about the temperament of the times results from a misreading caused by geopolitical differences and regional cultural uniqueness.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cultural relics of "family, country and the world" have worked together in forming a differential order pattern between the northern central area and the southern radiation area of geo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17-year period. Zhou Libo's novels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de performance", of which the real reason is to explore the personality representation and thinking mode of the Souther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adiation area accepting the northern political central discourse in this period. His works not only reveal the spiritual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ideological state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when the southern local discourse collides with the political central discourse, but also profoundly explore the discourse interpretation scene, meaning interpretation path and value identification logic where the southern local discourse accepts the political central discourse. The southern aesthetic discourse in the 17-year literature represented by Zhou Libo's novels has the nature of artistic classics, which effectively reflects the sense of hierarchy and richness of China's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Key Words: Zhou Libo's novels; southern aesthetic discourse; geopolitical ecology; personality representation; thinking model; nature of artistic classics

[编辑: 胡兴华]